马大华人文学与文化学刊，第十四卷，第一期，2026 年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Vol. 14, No. 1 (2026)

从广州到马来亚：融熙法师的佛教人生

杜忠全*
拉曼大学中华研究学院

摘要

融熙法师（1888-1958）是 20 世纪中期马来（西）亚的南迁华僧，虽然在马来亚独立建国的翌年就圆寂，但他把生命的最后年月留在当时新生的马来亚联邦，并且组织了马来亚佛学社（后更名雪兰莪马来西亚佛学社），拟展开弘化活动，惟夙愿未成。该经由他推动成立的居士佛学社，却一直延续至今，该社也一直奉法师为创社导师，影响力不可谓不存在。融熙法师是直至 20 世纪中期为止，马来（西）亚汉传佛教为数不多的学问僧之一。他虽然年届耳顺才披剃出家，但其佛学论述与活动，却不限于现出家相之后。除了弘化活动，融熙法师尤其留下了不少著作可作思想探讨，而一般谈论早期的马来亚佛教，皆以通俗弘化与民俗推广的信仰与仪式佛教为主，融熙法师最终落脚在新生的马来亚联邦，恰恰可提高马来（西）亚汉传佛教的思想深度。可惜的是，迄今为止的大马汉传佛教研究，尚未留意到融熙法师，这也许与雪兰莪马来西亚佛学社一直采低调行事有关。本文拟在宋燕鹏、陈爱梅合作之〈融熙法师：从华南才子到南洋僧侣〉一文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其早年的生命历程进行探讨，以见其从反佛到最终披剃出家的思想转折。

关键词：融熙法师、汤瑛、雪兰莪马来（西）亚佛学社、南来僧人、虚云老和尚

* 杜忠全，现为拉曼大学中华研究学院副教授兼系主任。电邮：tctoh@utar.edu.my

From Guangzhou to Malaya: The Buddhist Life of Venerable Rongxi

Toh Teong Chuan
Faculty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Abstract

Venerable Rongxi (融熙, 1888–1958) was a Chinese monk who moved from China to Malaya in the mid-20th century. Although he passed away the year after Malaya gained independence, he spent the last years of his life in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He founded the Malayan Buddhist Society (renamed the Malaysian Buddhist Society after 1963) with the intention of promoting Buddhism, but his death prevented him from fulfilling this aim. Nevertheless, the society he established has continued to the present day. Venerable Rongxi was one of the few scholar-monks in Malay(si)an Chinese Buddhism up to the mid-20th century. Although he was ordained only late in life, his Buddhist activities were not limited to the period after he became a monk. In addition to promoting Buddhism, he wrote many articles and books that reflect his Buddhist thought. Whereas early Malayan Buddhism was generally centered on folk beliefs and ritual practice, Venerable Rongxi's eventual settlement in Malaya added intellectual depth to local Chinese Buddhism. However, research on Malay(si)an Chinese Buddhism has so far overlooked him. Building on the journal article "Venerable Rongxi: From Southern China Talent to Nanyang Monk," co-authored by Song Yanpeng and Tan Ai Boay, this article further examines his early life in order to trace his ideological transition from an anti-Buddhist stance to Buddhist faith and, eventually, monastic ordination.

Keywords: Venerable Rongxi, Tang Ying, Selangor Malay(si)an Buddhist Society, monks in motion, Master Hsu Yun

一、前言

融熙法师（1888-1958）是 20 世纪中期马来（西）亚的南来华僧，虽然在马来亚独立建国的翌年就圆寂，但他生命的最后段落留在当时新生的马来亚联邦，并且组织了马来亚佛学社（后改名雪兰莪马来西亚佛学社），拟锐志展开佛教弘化活动，惟夙愿未成而示寂；无论如何，经由他推动成立的居士佛学社团，却一直延续至今。雪兰莪马来西亚佛学社后期的主事者虽然不曾接触融熙法师，却依然奉他为创社导师（宋燕鹏，2015，页 104），影响力不可谓不深远。

融熙法师是直至 20 世纪中期为止，马来亚为数不多的学问僧之一。他虽然年届耳顺才披剃出家，但其佛学论述与活动，却不限于现出家相之后。除了弘化活动，融熙法师还留下了不少著作，而一般谈论早期的马来亚佛教，皆以通俗弘化与民俗推广的信仰与仪式佛教为主，甚至有弘法者表示，一旦触及深邃佛教理论的演说内容，往往就较难取得现场听众的共鸣云云（杜忠全，2019，页 458）！然而，无可否认的是，即使在战前，除了法事服务者之外，也不是没有文化僧南渡马来亚投身佛教文化与社会事业的，如1930年代南来的芳莲尼师（1902-1937）之从事教育兼慈幼并创办菩提学院（杜忠全，2026，页 293）、明德法师（1909?-1974）在槟城佛学会讲经及主编《无尽灯》等等（杜忠全，2025，页 110），都极具时代意义，展现了马来（西）亚汉传佛教现代化转型的历程。融熙法师在 1950 年代独立建国前南来马新弘法，最终落脚在新生的马来亚联邦首都，恰恰可提升马来（西）亚汉传佛教的思想深度。可惜的是，迄今为止的马来西亚汉传佛教研究，还未曾留意到融熙法师其人，这也许与雪兰莪马来西亚佛学社一直低调行事，或融熙法师在马来亚独立建国的翌年（1958）就圆寂有关。本文在宋燕鹏、陈爱梅合作之〈融熙法师：从华南才子到南洋僧侣〉一文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更多的文献搜集，以见其早年从反佛到最终披剃出家的思想转折。

二、从反佛到护教：融熙法师的生命转折

融熙法师，俗姓汤，名瑛，字雪筠，号九指头陀，其先祖原籍浙江，因父亲宦游并定居广东，汤瑛遂在番禺出世，并在新式学堂之广东高级师范学校毕业，旋即出任番禺小学校长职。民初之后，汤瑛即开始出仕，先后出任广东省教育厅视学官、税务科科员、广东国民政府税务科科长（1925）、中央法币基金委员会税务科科员、陈济棠之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高等顾问（1931-1936）、广东省银行秘书处秘书（1936-1949）等政府机关要职（宋燕鹏，2019；释融熙，1992，

页 643）。[1]由此可见，一直到中国大陆政权更替而南走香港为止，他都是国民政府的在任公务官，并以公务员的身份参与佛教活动。

融熙法师之出生与成长时期，是近代中国佛教面对极大冲击的年代。在他 20 岁前后，即 1908 年的前后时期，是清政府洋务派推行体制内变革，继而引发庙产兴学运动的历史阶段。这是中国近代佛教所面对的第一波庙产兴学运动，以张之洞（1837-1909）为首的朝廷官员立足儒家来批评宗教，并按此推出相应的政策，意图提拨庙产以作教育兴国之用。类似以宗教“无益生民”而当废的言论，虽然引起佛教界与一些学者的反击（邓子美，1996，页 106），但对于佛教教义全无所知的一般人，特别是世俗青年而言，确实容易引起共鸣的。后来积极投入佛教研修活动的汤瑛居士，坦诚自己早年因阅读革命派发行的报刊，在时代潮流下鼓舞了革命思想，对于传统文化多所扬弃，对佛教尤其持质疑乃至反对态度，甚且曾为文批判之。按他在 1954 年讲课时指出这一四十余年前之旧事来推算（释融熙，1992，页 323），可知为文反佛之事当发生在他 20 来岁的青年时期，此时大约是 20 世纪 10 年代前后之清末民初的新旧交替时期。

按融熙法师自叙，其早年原反佛，惟至迟到了 1920 年，他就参与组织了广州佛教阅经社，并在该居士佛教组织中主导了佛教义理研讨和禅观修习活动，如在〈白蚁禅话〉一文的弁言中说：“民国九年，广州佛教阅经社成，夜间与社友习禅观。星期日集社友颂弥陀。念佛一支香。朋辈叩击，机辩纵横，商量浩浩地，像煞介事”（释融熙，1992，页 19–20）。此时他约 32 岁。按此可以推知，到了这一时期，他已兼通佛教的理论与实践，才能在阅经社主导义理讨论与禅观修习活动，甚至到了“人莫能屈”的程度。无论如何，从民元前后的撰文反佛到 1920 年之热衷并熟知佛教，此中的过渡与转折，迄今尚未能找到更多的史料来论述或印证。融熙法师在第一部结集出版的专著《葛藤集》（1955）中自叙生平，对于这一思想转折，仅简述如下：

> 反正后，偶读内典，颇有所会，由是公余辄手一卷，游心物外，聊以自娱。民十三年，岁甲子，病且死，先继妣罗太夫人，少侨暹罗，染其俗，代许愿出家三年，病果愈。……（释融熙，1992，页 3）

按此，民十三年（1924）“病且死”的因缘，已在他参组广州佛教阅经社之后了，可见不是他接触佛教的导因，而是此前之“偶读内典”；此外，他也尊其继母所发的愿而披剃出家三年，“在寺时曾阅三藏经一过”，到了 1927 年的三年期满即返俗，重新回到仕途（释融熙，1992，页 578）。按此，在这三年的短期出家，

[1] 兼参前注宋燕鹏〈融熙法师〉文及未署作者之〈融熙法师事略〉，后文收入释融熙（1992，页 643）。以下生平凡按宋著作〈融熙〉一文及〈事略〉者，概不加注。另，《融熙法师丛著》原版为雪兰莪马来西亚佛学社于 1970 年为纪念融熙法师圆寂 12 周年而出版，1992 年香港佛经流通处为纪念融熙法师圆寂卅四周年而重刷流通。

让他得心无旁骛地研修佛典与行门，甚至把藏经都遍览一轮，对佛教解行方面的理解，得以大幅度地提升才是。

关于其人生思想态度的转折，他在香港新亚书院讲授“佛教与禅宗”时，曾更详细地提及：

> 反正后，沪上王一亭、濮一乘、狄楚青诸先觉，创佛学丛报，更引起不慧的怒火。于是汇一百元与友人，托尽量请购佛教经书寄粤。……当时不慧抱着“入室操戈”的恶意来读它。（释融熙，1992，页 324）

查上海《佛学丛报》之创立，是民国元年（1912）冬天之事（释妙然，1995，页 67），此当是现代中国佛教出版报刊之起步阶段（邓子美，1996，页 188），高振农指出，该《佛学丛报》于 1912 年 10 月创刊，前后出版 12 期，1914 年因经费不支而停刊（高振农，1992，页 390）。按此可知，汤瑛居士缘此一怒而购读佛书，是这一年之后的事，约经六、七个月，“才晓得佛教原本是人人性分本具之学，不同其他宗教”（释融熙，1992，页 324），此后开始投入佛教之研修。此时他已在公家职事中，因此是“公余辄手一卷”，再加上履行病中的发愿而出家三年，此期间得专心研读佛教典籍，直至 1920 年广州佛教阅经社成立之时，他应已积累了近十年的个人研修经验，如此才能在阅经社担纲佛学研修主导者的角色。按此可知，早年的汤瑛居士从反佛到信佛之思想转折，主要是由两大导因构成，其一为民元后因反佛激烈，一怒而购读《佛学丛报》以求知己知彼来反佛，惟经阅读佛教书刊而逐渐理解佛教与佛学，进而养成偶读佛典的日常习惯；其二是一度病情殷重，因继母笃信佛教而入佛寺短期出家还愿，故而得更切身地接触佛教。因此，汤瑛居士早年从反佛到信佛，其接触佛教的过程，是从文字到切身亲历的，才促使其发生思想转折，对佛教的态度产生巨大的变化。

至迟自 1920 年开始在广州积极参与佛教研修活动的汤瑛居士，对当地佛教的诸多事情，皆有所参与，如长期担任广东佛教会秘书（释融熙，1992，页 647）、罗浮山五座佛寺及道观之产业财资遭地方豪强侵吞而告官得直一事、广州五大丛林之华林与大佛寺遭当政者毁寺筹饷（1923）（释融熙，1992，页 32）[2]、共同发起并完成广州首刹六榕寺重修花塔（1933）（余庆锦，1999，页 81）[3]、二战后六榕寺爆发管理权移交纷争时参组护法委员会并担任秘书一职（余庆锦，1999，页 87–88；释融熙，1992，页 647），以上种种，他都以在任公职与自身的社会人脉

[2] 华林与大佛寺事，可见〈白蚁禅话〉一文所叙与陈少白（1869-1934）交往事。
[3] 2018 年 12 月 2 日趁学术会议之便，赴广州六榕寺勘察融熙法师当年活动的旧地头，该寺花塔左侧的一堵长墙，可见到多方嵌在墙壁上的旧碑，其中的一方刻有〈重修六榕寺花塔委员会职员姓名〉，列文书处副总干事二人，其中之一即汤雪筠，也就是在俗的融熙法师。无论如何，目前该寺的住持法师并不知道融熙法师其人，也无法提供汤瑛或汤雪筠居士的相关资料。在俗的融熙法师在六榕寺活动，是民国年间的旧事，而他出家之后以法号融熙法师行世，是离开广州之后的事，尤其后来远赴东南亚而圆寂，事隔六七十年，现在的常住僧人对汤瑛或融熙法师的事迹有所隔阂，原是在情理之中的。

来居间联系，落力为佛教乃至道教在反宗教的社会情势下遭侵蚀，提供协助及积极争取社会公义。

在中国期间，他的佛教活动大致以广州市为基地，对当地首刹六榕寺的事务尤其多所护持，既是该寺解行学社的积极成员（释慧光，1974，页 35），《广州六榕寺志》也提及，1932年以解行学社主干成员来“共同发起议定〈重修六榕寺花塔委员会章程〉”事，证实其时六榕寺确实有此居士结社，惟未志成立年份（余庆锦，1999，页 81）。融熙法师（汤瑛居士）自身亦留下未志年份之〈解行学社建立解行精舍后所负之使命〉一文，显见其参与其事（释融熙，1992，页 562–570）。到了 1933 年，更协同在该寺创办六一佛学研究会，推广佛学研修活动。[4]1947 年国共内战爆发，他被委在广东北部执行公务，得遇当代禅宗宗匠虚云老和尚（1840?-1959）于韶关南华禅寺，并因此因缘而契入禅旨并皈依虚老，虚老乃为赐法名宽筠（释融熙，1992，页 643）。公务毕回到广州之后，即于是年 3 月推动及创办了佛教刊物《圆音》月刊，到了 7 月的第五、六期合刊，推虚云老和尚为社长（黄夏年，2006，页 414），而自翌年 3 月的第七、八期合刊开始，即自己担任主编（黄夏年，2006，页 480）。他以佛教薪传与护法为当时佛教所面对的两大问题，并以此为该月刊所担当的使命（释融熙，1992，页 683–684），每期撰写多篇不同类型的佛教文稿， 此如梁永康在〈记融熙法师〉一文中指其办此月刊是“独力支持，勤于写稿”的（梁永康，1984，页 130）。《圆音》月刊前后发行了 10 期，因资金无以为继，1948 年发行最后一期，即第九、十期合刊之后宣告停刊。

按此，汤瑛在粤期间的居士佛教活动，可归类为以下几类：一、参与组织居士佛学研修社，推动佛学研讨和修习活动，此先后有广州佛教阅经社、六一佛学研究会等；二、以公职人员之便，行护法、护教之事，尤其于佛教寺庙遭执政当局及地方豪强侵占之时，予以拨乱反正；三、发行并编辑佛教刊物，并积极撰写弘阐佛教义理的文章，期许能达到广传佛教与护法传薪的目的。在此期间，最重要的是，他与虚云老和尚之间所建立的关系，这一师弟关系，一直到他披剃出家之后，依然维持不断；晚年他在马新的书函中，概以“师尊”尊称虚老，如〈示岑星仁〉函有“接到伯老转来 师尊虚云老和尚，由江西云居山寄来质疑书一卷，……”此函当是 1955 年所书，此时他已披剃并南来，但作此书时，尚未驻锡吉隆坡，故信末有“吾下月稍暇，当来隆相晤”句（释融熙，1992，页 319）。佛法知见上凡有所疑乃至出版著作，皆函寄身在中国大陆的虚老征求意见；虚老接到书函，也会予以复函，他们的关系，可见一斑。

[4] 按 2018 年 12 月 2 日访六榕寺所见，该寺著名的花塔犹矗立在山门内，汤瑛居士当年参与活动的解行学社，其社名依然与该寺建筑同在。六榕寺花塔所在的庭院一侧的墙上，镶嵌着几方旧碑文，其中的〈重修六榕寺花塔委员会职员姓名〉，尚可见到“汤雪筠”三个字，汤雪筠即汤瑛，也就是出家后的融熙法师。然而，向寺方询及汤瑛乃至融熙法师，一概无所知悉。无他，汤瑛之在六榕寺活动，是 70 年前的民国旧事，其出家及最终落脚处，都不在广州或六榕寺，人事几番蹉跎，其离穗之后的事迹不为六榕寺方面所知悉，亦在情理之中。

1949 年中国大陆政局激变，他也在这一历史时期离开广州而南下香港，以逾六十之龄先在港赋闲，时暂住荃湾竹林禅院，也在 1950 年 12 月一度以竹林禅院为基地将《圆音》予以复刊，惟仅发行至翌年 12 月两期而止（邓家宙，2008，页 84–85；黄夏年，2013，页 471）。虽如此，四方佛刊之稿约依然不断。1951 年至早在年中之后[5]，他在香港街头遭疯汉袭击致昏厥惟无伤之后，毅然在竹林禅院寻求披剃，与香港荃湾的竹林禅院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期作为北僧南移潮中，其中的一个南迁僧人的挂单地点有关（邓家宙，2008，页 27）。剃度师为该寺住持融秋法师（生殁年不详）。虽然他礼请融秋法师为之披剃，但融秋法师以汤瑛是广州南来之有修有德名居士，不敢以师礼待之，为取法号“融熙”，是示同辈之意。

在港现出家相后，融熙法师翌年（1952）圆戒于大屿山灵隐寺，此后随缘应邀讲经，如曾在竹林精舍讲《金刚经》（释融熙，1992，页 655）。在港期间，融熙法师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是他于 1954 年 3 月应唐君毅之邀，在新亚书院讲授以“佛教与禅宗”为主题的专题课，开创香港僧人在大学课堂讲课之先河（邓家宙，2008，页 83、125）。按此次的讲课内容，他整理并撰写成〈佛教与禅宗〉的系列文章，逐期发表在《海潮音》月刊，尔后结集为单行本《佛教与禅宗》并印行一千册，分赠读者（释妙然，1995，页 301）。

融熙法师于 1954 年在新亚书院等讲坛授课之后，便离开香港南迁新加坡了。按僧人震旦的回忆，他是应新加坡道荣园闻修老和尚（生殁年不详）之邀而南渡，初在灵峰菩提学院开讲《六祖坛经》，获极好的反响（释融熙，1992，页 646）。同时，他也应请担任大觉寺住持，志航法师为监院（释妙然，1995，页 308）；另外，另有说，大觉寺为志航法师创建于 1950 年，主要是流通佛书，对当地的佛教文化贡献良多，惟相关的简略介绍未提及融熙法师担任住持事（释传发，1997，页 175）[6]并代表新加坡出席世界佛教友谊会的第四次会议[7]。此后，他在马、新两地之间经常往来弘法，[8]包括应邀讲经、在电台作广播弘法等等。驻锡新加坡期间，他整理出版了《葛藤集》及《无相颂讲话》等书。融熙法师的《葛藤集》分正集、续集和拾遗，其自序文于 1955 年春作于新加坡大觉寺，按虚云 1955 年 5 月 25 日的覆函，该书此前已呈虚老过目，虚老遂于覆函中建议删改部分文章。虚云的覆函见收于《融熙法师丛著》（释融熙，1992，页 197），亦见净慧主编的《虚云和尚全集 2：书信•文记》（释净慧，2009，页 91）。《葛藤集•续集》中收〈马来亚佛学社成立日讲词〉、〈卫塞节之广播词〉二文，而马来亚佛学社成立于 1957 年 1 月，该电台广播词也是融熙法师在吉隆坡马来亚广播电台的讲词，按此推论，

[5] 《葛藤集拾遗》中所收往复函件，有〈致金弘恕居士书〉，信末署“同门弟宽筠拜覆，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二日夜书”，宽筠是汤筠皈依虚云老和尚为俗家弟子的法名。

[6] 按释妙然之《民国佛教大事年纪》，融熙法师于 1955 年旧历腊月晋山为大觉寺住持，志航法师为监院，见该书页 308。另按《新加坡佛教发展史》一书，大觉寺为志航法师创建于 1950 年，主要流通佛书，对当地的佛教文化贡献良多，惟该简略的介绍未提及融熙法师担任住持事，见释传发（1997，页 175）。

[7] 《融熙法师丛著•葛藤集拾遗》第一张附图之图说。

[8] 实际上，1965 年 8 月 9 日新加坡独立建国之前的英殖民时代，马、新原是马来半岛之一体，只存在殖民行政体制之区别，而不存在国界线。

续集应是融熙法师落脚于吉隆坡之后所编。至于拾遗一集，则应是其 1958 年融熙法师圆寂之后，由他人编辑其遗稿及书信所成者。值得一提的是，《无相颂讲话》是为数不多之《六组坛经》“无相颂”白话解释本，此颂是禅宗思想的精华部分，融熙法师的解释，特别值得关注（于凌波，1973，页 232）。

融熙法师最初于 1955 年应邀到马来亚联邦，包括在吉隆坡、怡保、槟城等地巡回说法。到了 1956 年 1 月 6 日，他与当地的弟子在吉隆坡成立马来亚佛学社，正式落脚马来亚首都，并打算以此为基地来展开后续的长期弘法，实践离港之时虚云老和尚函示之“佛道移南”意旨。此期间，他也撰写及发表 33 则《百喻经》经文之白话解说于《无尽灯》月刊，并结集为《百喻经选讲》一书。此是他生前最后整理出版的著作了。1958 年 7 月 27 日（农历戊戌年 6 月 11 日），即马来亚佛学社成立的一年多之后，融熙法师在吉隆坡示寂。

三、融熙法师与禅宗的关系

融熙法师以比丘身来从事佛教活动，始于他流寓香港并剃度之后。若以他圆戒才具比丘身份之 64 岁始计，直到他 71 岁圆寂为止，僧腊只约六七年。反之，他以汤瑛居士的在俗身份参与佛教研修及护法活动的阶段，则长达 30 余年之久。然而，从他晚年结集的几部作品来看，迄今的传世作品，尤其是他自己亲自整理结集的几部著作，主要还是他出家后直至圆寂前的晚期作品，分别写作于香港、新加坡和马来亚联邦。他自己整理结集的出版著作中，只有《葛藤集•续集》一书，收有少部分注明是完稿于民国年间的旧作，亦即他在家时期的作品。至于后人为之搜集整理的《葛藤集•拾遗》，才较多地搜罗及收入他早期的旧文，再参杂以部分后期所撰而未及编入前两部文集的遗作。如以他早年未接触佛教时期即为文反佛之举，研读佛书并参与佛教组织的禅修活动之后，直到他离穗赴港为止，俗家时期的汤瑛居士在漫漫三十余年间，应当也撰写与发表了不少阐理与护教文章。这些民国年间的旧稿，相信仍有大部分未及搜集与出版，故而迄今尚无法见到融熙法师（汤瑛）作品的全貌。

融熙法师后期的结集作品中，禅宗的相关主题，占了相当突显的内容。专著中的《无相颂讲话》、《佛教与禅宗》等都是，而在《葛藤集》、《葛藤集•续集》中，除了一般普及性地阐明佛学要领，以及部分关于中国佛教文化与宗派思想的讨论之外，禅宗见地及涉及禅净之双修、单修问题的文字，尤其引人瞩目；其为单篇文章的结集取名为“葛藤”，并且一而再地形成系列，就是源自宗门术语了。按此，融熙法师倾心于禅宗，是显而易见的。有关融熙法师佛学论述中的禅学思想，因篇幅不少，文字繁多，条贯性的梳理与剖析，需要结合更多的文字征引来展开论述，略举其中的显著特点，即他认为，在中古中国佛教的八宗之中，禅宗大谈“自性”清净，与祖述龙树性空论之三论宗所阐发的诸法“空性”并无二致，“三

论与禅，同是一娘所出”（释融熙，1992，页 86），这如他在〈我对于三论宗与禅宗的认识〉所说：

> 龙树菩萨说：“以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以毕竟空为一切法缘起。力破“自性有”见。禅宗却已“自性”为一切法缘起。在字面上，很容易让人误会两宗的矛盾的。而不知六祖所说的“自性”，与外道执有“神我”为自性绝不相同。六祖以世人向外驰求。为对症发药，叫他回头，向人人自有的真如本性反照，假名自性。（释融熙，1992，页 86）

这样，他主张以六祖为代表之禅宗“自性”说，与三论宗所宗龙树论的“性空”论，名异而实同，且终究是以“性空”论为宗，这是融熙法师论禅之特见。如此论禅，他不只做一次性论述，在香港新亚书院所作〈佛教与禅宗〉系列演讲时，也这么说：

> 我们要知宗门所谓“自性”它不是一件有自体的东西，与外道数论宗和“神我”相对的自性不伦。而且连自性两字之名都是假立的，坛经云：“无名可名，名于自性，无二之性，是名实性。”又云：“自性无一法可得。” 自性无一法可得就是性空，所以三论宗之破自性，与禅宗之邀见自性，名相反而实相成的，……（释融熙，1992，页 338）

如此，则融熙法师在教行方面倾心于禅宗，却又与 20 世纪前半期中国佛学复兴（丁建华，2019，页 6–7），隋唐之后沉寂近千年的三论宗乃至龙树论又开始被时人阅读与讲授、讨论的背景（丁建华，2019，页 12–21），理应有着一定的时代性关联了。

融熙法师与禅门的关系，除了撰文写书方面的紧密联系之外，他与虚云老和尚之间的师弟关系，也是一条清楚的脉络。自 1947 年拜师皈依之后，两人的关系就建立起来了。如前所述，他当年在广州六榕寺办《圆音》月刊，即尊虚云老和尚为社长；1947 年 9 月下旬，虚云老和尚到广州进行系列开示，他也随行记录及整理，再发表于《圆音》月刊。虚云老和尚函复融熙法师的信，按净慧所编《虚云和尚全集》（2009），计有 4 封，然在融熙法师的《葛藤集•拾遗》一书，依然能找到 1948 年 2 月 23 日（元月十四日）虚云老和尚就汤瑛在《圆音》第七、八期合刊所撰之〈辟湛愚心灯录〉一文阅后的覆函一封，信中既有嘉许，亦有不肯与的部分意见。按此可知，自 1947 年皈依之后，直到 1958 年融熙法师在吉隆坡圆寂为止，他与虚云老和尚之间的书信往来，理应不限于《虚云和尚全集》所集的区区几封的；融熙法师自己在文集中收录的虚云老和尚复函，是跟他的文章有关的一部分而已，两人之间的书函往来，在 1947 年到 1958 年的十余年间，理应还存在不少的才是。更甚的是，在融熙法师与他人的书信中，都尊称虚老为“师尊”，对在家而同尊虚老为师的佛弟子，则称“同门”——即使在披剃出家之后，依

然以“同门”相称，如作于“丁酉年（按：1957）浴佛节前十日”的〈与某老居士论见道和保任问题〉一函，末署“同门方外弟 融熙作礼”（释融熙，1992，页 287），又作于 1958 年 1 月 18 日，即他圆寂半年前的〈与宽尊同门商念佛闭关事〉一函，末署“同门老朽 融熙和南”（释融熙，1992，页 289）。因此，不管是在俗还是披剃之后，他最为尊崇的，都只有一个人，即虚云老和尚，[9]而虚云老和尚是禅门宗匠，故而融熙法师以禅为自宗，即使讲经说法，如“在竹林精舍讲《金刚经》等，语不离宗”（释融熙，1992，页 655），他在佛法见地上，始终以禅宗为宗要，是顺理成章的。1958 年圆寂之后，马来亚佛学社在吉隆坡广东义山为他立塔，上书“南宗法脉”（宋燕鹏，2015，页 103–104），算是总结了他一生学佛弘法之与禅宗之间的关系。

无论如何，我们如今除了知道，融熙法师于 1947 年以居士身在虚云老和尚门下参禅并皈依，以及此后十余年的书信往返，包括他向虚云老和尚请求释疑，以及虚云老和尚命他撰文评驳有关禅门见地的教界文章之外，两人之间是否具有禅宗的法脉关系，即身挑五家禅宗法脉的虚云老和尚，是否将其中一支法脉传予融熙法师，让他们师弟之间的关系从皈依师徒提升至法脉师弟，从而将马来亚佛学社当年所立融熙法师塔之“南宗法脉”进一步地核实，迄今尚无更多的史料来确证。然而，融熙法师暮年出家，僧腊不足十年即圆寂，按佛制，他除了在家弟子与信徒的追随，理应没有剃度出家徒弟，至于是否承接了虚云老和尚的禅宗法脉，则是另一回事了。融熙法师塔之“南宗法脉”，应是他的随身俗家弟子多年的追随并耳濡目染，深切体会融熙法师生前对虚云老和尚及宗门之追慕，故而为之立塔时作此铭记。此“南宗法脉”对融熙法师而言虽不即，亦不离。

四、结论

融熙法师一生 71 年的生命历程，经历了大半段落的居士和晚年短短六、七年的出家生涯，无论是在俗还是披剃出家，他的佛教态度，都是一贯地以禅为宗；他办刊物写文章，包括专文写作或对僧俗的请教予以覆函释疑，也每多扣紧禅宗见地来作覆。但是，在中国广州时期，没有数据显示，他与当时堪称已成热潮的居士领禅之风，具有任何的联系。从早年的反佛到壮年之后的信佛护教，汤瑛居士所扮演的，都是佛门外护的积极角色，如以自己作为俗家佛弟子的身份与身在公家机关任职之便利，协助面对问题的佛寺疏通与解决棘手的庙产遭侵占问题；

[9] 雪兰莪马来西亚佛学社有原址的旧社与新社，旧社被征地缩小之后另建的新社，在雪州南部的蕉赖（Cheras）区。值得一提的是，该堂皇新社虽然是近年才增建，惟设有“虚融讲经堂”；讲经堂以虚云老和尚和融熙法师之名合称，可见虽然间隔了半个多世纪之久，雪兰莪马来西亚佛学社同人依然深知创社导师融熙法师与禅宗名宿虚云老和尚之间的关系，故有此命名。

他组织居士佛学研究社团、撰写文章、创办佛教刊物等等，积极阐扬佛教义理及推动在家佛教徒的如理修行。基于年代久远，除了在家追随者之外，没有数据显示他收有出家弟子[10]，而当年追随他的在家弟子，迄今也都已谢世。以马来西亚而言，虽然跟融熙法师关系最为密切的雪兰莪马来西亚佛学社，在他圆寂之后的第二周年、十二周年及九十周年诞辰之际，都分别以重刷出版他的遗作或生前读经录的方式，来纪念作为创社导师的融熙法师；对于一个勤于写作的学问僧来说，出版著作无疑是对他的最佳纪念方式，但这些书里头，都无法透露他的法脉师承等相关信息。因此，目前只能以“虽然融熙法师尊虚云老和尚为师，但是否具法脉师承则无法确知，也未有剃度弟子”来暂作结论。

这样，或许可以说，无论是汤瑛居士还是融熙法师，僧俗身份的转变，并没有改变融熙法师在佛教界所扮演的角色。从广州在俗时期的广州佛教阅经社、六一佛学研究会到雪兰莪马来西亚佛学社，他都是居士佛学研究社团的推手。出家之后，虽一度应请在新加坡担任佛寺住持，但他一生没有开山建庙，身后留下的有形遗产，是几部分别曾在马来西亚、香港、台湾等地出版的著作，以及以他为创社导师的雪兰莪马来西亚佛学社了。其身后的著作流通方面，除了雪兰莪马来西亚佛学社接连出版他的遗作之外，香港的信徒“温宅众子孙”透过香港佛经流通处重刷印赠马来（西）亚佛学社的《融熙法师丛著》。此外，台湾佛教印经会也曾在1962年及80年代上半叶，以单行本的形式印刷流通融熙法师的几部著作（阚正宗 2008，页 32）；其《葛藤集》也为台北天华出版事业有限公司正式出版，迄今仍在流通。

因此，可以这么说，汤瑛居士一生的大半个段落，都是在其出生地广州，尤其是六榕寺积极参与佛教与佛学活动。但是，作为知识僧的融熙法师，他保存到现在并已经整理而出的佛教期刊发表及结集作品，主要还是在离开广州之后的流离岁月中次第完成的。迄今为止，他留在广州而活动量最充沛的壮年岁月，依然是留白的多；他离开广州而辗转经香港、新加坡，最终落脚在马来亚，除了自己留下的文字堪可追踪之外，其他的人生事迹，却绝少留下较为详实的文献资料。本文在有限的时间里，将颇为零碎的片段记录串联起来，以勾勒出融熙法师的人生轮廓，尤其对早先发表的宋文作出补充。更进一步的梳理与论述，只能等待未来更多的旧档案翻找，才能继续完善了。

[10] 终其一生，融熙法师的戒腊不足十年，按佛门惯例，他没有出家弟子，并只能组织居士团体来领众弘法，是在情理之中的。

参考文献

陈兵、邓子美（2003）。《二十世纪中国佛教》。现代禅出版社。
邓家宙（2008）。《二十世纪之香港佛教》。香港史学会。
邓家宙（2015）。《香港佛教史》。中华书局。
邓子美（1996）。《传统佛教与中国近代化：百年文化冲撞与交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丁建华（2019）。《近现代佛教空有之争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杜忠全（2019）。唯识学在马来西亚汉传佛教界的传播。载释光泉（主编），《唯识研究（第六辑）》（页 454-462）。商务印书馆。
杜忠全（2025）。明德法师与印顺法师的交际及其生殁年问题。*台湾宗教研究，24*（2），105-131。
杜忠全（2026）。芳莲尼师的南来与马来（西）亚汉传佛教的现代转型。载中国文化大学文学院（编），《朱舜水与东亚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页 277-296）。万卷楼图书公司。
高振农（1992）。《佛教文化与近代中国》。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黄夏年（主编）（2006）。《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 102 卷》。全国图书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黄夏年（主编）（2013）。《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三编•第 28 卷》。中国书店。
阚正宗（2008）。解严前（1949-1986）台湾佛教的印经事业。*佛教图书馆馆刊，*（48），19-36。
赖永海（主编）（2014）。《中国佛教通史•第十五册：明清民国》。佛光出版社。
梁永康（1984）。《广东佛教史》。中华佛教图书馆。
释传发（1997）。《新加坡佛教发展史》。蒹葭院。
释慧光（1974）。广东历代诗僧简介（廿四）。*内明，*（27），35。
释净慧（主编）（2009）。《虚云和尚全集 2：书信•文记》。中州古籍出版社。
释妙然（1995）。《民国佛教大事年纪》。海潮音出版社。
释融熙（1992）。《融熙法师丛著》。香港佛经流通处。
宋燕鹏（2015）。《马来西亚华人史：权威、社群与信仰》。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许颖（2010）。《近现代禅净合流研究》。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于凌波（1979）。《佛门人物志》。传记文学出版社。
余庆锦（1999）。《广州六榕寺志》。六榕寺。